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老舍与中国

LAOSHE YUZHONGGUO
XINWENHUA

吴小美 JIANSHE
魏韶华 著
古世仓

新文化建设



民族出版社

LAOSHE YU ZHONGGUO
XINWENHUA JIANSHE

老舍

与中国新文化建设

吴小美
魏韶华 著
古世仓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2
ISBN 7-105-07945-2

I. 老… II. ①吴… ②魏… ③古… III. ①老
舍(1899~1966)—人物研究②老舍(1899~1966)—文
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37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内容提要

这是充满文化关切而又富有生命激情的“对话”。在这里，老舍不只是一个纯客观“知识对象”，而是一位曾经穿行于现代文化时空中的思考者与践行者。研究者力图接住老舍掷向今天的文化课题，并寻求当代的应答。这一独特的视角使他们在“文化老舍”面临“过度阐释”的当下，仍能以此为视点拓出一个全新的学术扇面。本书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宏观视阈中从文化理想、人性探索、个性气质以及生死观等方面展开，其本身就是一部现当代中国的文化启示录。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W051)的结项（证书号为20060369）成果，结项成绩为优秀。

目 录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作家老舍”论纲	1
一份现代中国的文化启示录	
——从《离婚》、《懒得离婚》、《中国式离婚》说开去	7
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	29
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	52
论老舍的文化寓意小说	80
老舍的人性探索小说	96
论老舍“幽默”的主客体统一性	123
老舍的生死观	140
老舍个性气质论	166
开创“老舍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	
——新时期老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88
拓展与沉寂：近十年老舍研究的再研究	227
我们的追求（代后记）	251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 “作家老舍”论纲

老舍，这位世界级文化精英，20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已经离我们永去达40年之久。老舍的文化和文学业绩，虽然已经沉淀为稳定的历史形态，但回首当年，这位有着极其独特的“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身世经历，有着惟他所有的独特的个性气质和无人可取代的艺术风格，有着如鲁迅所说的“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顽强的承担命运和热忱奉献精神的人民艺术家，是永远活在善良、向上、进取的人们心中的。

不论是阅读老舍、认识老舍、纪念老舍，都已经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内部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现代人的素质修养，都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深长的历史意义。几十年来，老舍曾长期未得到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甚至受到过误解和责难，除了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的客观原因为外，偏颇的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以及单一的研究视角也是严重的主观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那种种阴云，读者和研究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老舍之为老舍，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点，乃至他的真价值和世界影响，主要是在

文化层面上，在他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以及这种文化所派生的国民性的开掘剖析中。老舍的全部创作着力思考和精心表现的几乎都是中华民族在现代走向中的主体建构问题。老舍一方面深感本民族的老大愚弱而神往古老民族的新生，另一方面又为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式微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化人在价值判断上的进取和困惑。老舍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面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性格作出不断的突破；他秉承思想启蒙的题旨，却主要从文化、礼俗、心理层面对他的时代作了精妙的表现。因此，他的创作可以称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战。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共同将老舍放在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碰撞和长达百年的文化反思中去考察，发掘他在双向文化批判中与同代文人的共性以及他独特的个性。

老舍成长于乡土性的北京市民社会文化环境中，精神上不可避免地浸染了近现代旗人礼俗文化的哀歌色彩，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给了他现代的眼光。20年代和40年代的两个后半期，他又两度深入英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社会生活，对东西方文化获得了较深的体验和整体的比较，为他思考中国文化问题，建构有自己特色的新文化模式提供了可能性。经过二三十年代、全民抗战和新中国三大阶段，老舍以毕生的创作实践，突出了跨越东西方文化模式的建构。中国的现代化是民族生存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诚如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有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

灭亡。”他确信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层面上的人的现代化；他的创作历程也就是他文化探索的旅途，而他的文化探索的优势，就在于他在上述宗旨下，以东西方文化互为参照，双向选择，将新文化的建构真正落实在中国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在全国解放前，老舍就形成了中国化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大同理想，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这大同理想确有其空想色彩，但我们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趋势去反观，它分明又具有一种可贵的世界意义即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共融。在老舍的晚年，迎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以加倍的热情和更加勤奋的创作，成为“五四”以后就开始文学生涯而到解放后仍葆有旺盛的艺术青春，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最为突出的一位老作家。他一方面热情地渲染社会主义新人的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一方面仍然尽力深入到传统文化的积习对广大人民告别昨天的羁绊这一精神文化层面，精妙地描绘老中国儿女——旧式北京市民笑着向昨天告别的心路历程。老舍完成于新中国的部分优秀作品，也仍然贯穿着他创作的思想启蒙题旨，这不仅在今天仍葆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创作母题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十分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

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的地位，也就是他之所以能牢固地屹立存活于历史的长河中，与他极具艺术魅力的独特风格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细加品味，老舍正是以风格的特异著称于世界，并且终生都在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风格。他首先以最独特的方式感知自己，也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时世，才能写出那样一个独特的艺术

世界。他从不跟着别人跑，所以他全部的优势和缺陷都是他自己的！对比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更长于理性的历史判断的作家，老舍无疑更多的具备情感上的真诚与感受上的敏锐。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较之同代其他作家更多更剧烈的情感道德意识与理性历史意识的彼此冲突与消长。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能力，他那深厚的生活底蕴和超越意识，使他创造出了无愧于世界一流的语言艺术家才能奉献出的文化艺术的北京，使他和北京共同存在，互为创造，也使得他笔下的祥子能拉着一辆人力车而跑遍世界！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大家所塑造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和悲喜交融的幽默艺术，根本上来自他文化心态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战冲撞。他在北京市民社会本色的生活中同时挖掘传统文化的阴魂与亮色、负面与正面，既透视国民的劣根性，又希望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为参照，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觅道德人性、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补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危机，弥合新旧文明的断裂和人的异化。要知道，他选择了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和多么艰难的工程！越是艰难，老舍就越不情愿做出简单的抉择和判断，而只能选取一种惋惜、规劝和宽容。这种半是恨半是爱的态度浸润于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人物、事件、细节中，既营造了他的艺术世界丰厚的文化内涵，也形成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独树一帜，无可取代或重复的亦冷亦热、亦庄亦谐、悲喜交融的幽默艺术。从这种艺术风格中，我们不但看到了老舍之为老舍的幽默心态，他的艺术世界的“匀调之美”和“浪漫精气”，同时还叹服于他那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老舍不仅继承着鲁迅的传统，而

且在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这两大工程中和鲁迅是契合的。重塑民族新文化的理念和激情，将他们联系了起来；鲁迅寄情于“民族的脊梁”，老舍种下了“精神的庄稼”。他们全部创作的主旨，其实都在于期盼中国和中国人能获得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这种眼光只能在“对话”中获得，他们自己就是屹立于这“对话”前沿的巨匠。中国式的世界观和生活模式的到来，很需要这样的作家的引导！

今天，当政治、经济都已“旧貌换新颜”后，人的思想痼疾远远没有清除，甚至还严重存在。这正说明鲁迅、老舍们所坚持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灵魂重塑、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中国的重新开放，面对世界，文化问题必定不断地会引起强烈关注。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最终的依据是它能否使国家强盛，能否使人民大众获得做人的尊严。老舍在《方珍珠》中连用了三声“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发出了人性尊严的宣言，今天回顾起来，老舍是在寻找一条光明文化的通道，与当前“以人为本”的要旨是契合的。其实老舍从他早期创作开始，就总是把小说中的人物设置在一个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让人物去与一种新文化包括域外文化环境相碰撞，碰撞中或失败、或融合、或再冲突，都有作者的眼光和深意。这说明，老舍这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作家构筑文化建设的“情结”。因为他是看过世界的人，深知跨越各民族、跨越社会与文化藩篱才能自强！现在是到了实现前辈的“强国梦”的时候了！

走近老舍，重读老舍，我们会不由得慨叹文化变革的不易。此时，我们更需重温一些优秀作家的遗产。许多优秀作家的艺术世界都是一种跨文化的产物，其客观性、转型性，

乃至作为 20 世纪中国及世界巨变的深层精神轨迹，都始终联系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消解与重构。学习老舍，很重要的是认识老舍创作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主旨和母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意义和机遇，在推动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一份现代中国的文化启示录

——从《离婚》、《懒得离婚》、《中国式离婚》说开去

只要一论及老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论者最直接联系起来的，往往都是邓友梅、苏叔阳等京派小说家，以及受到《茶馆》为代表的老舍剧作深刻影响的《左邻右舍》、《家庭大事》、《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等剧作。如果从美学追求和文学风格来论，这种联系是准确的。但如果进一步放开眼光和视域，我们可以发掘到一些看似与老舍及其作品并无直接承传关系的作家作品，却在惊人接近的视点中共同关注着我们民族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由此说明，老舍之为老舍，他对当代文学的确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在暗示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在继承现代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良性循环。引入本文视野的，除了创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老舍的著名长篇小说《离婚》外，就是 80 年代谌容的中篇小说《懒得离婚》^[1]以及王海鸰的新作长篇小说《中国式离婚》^[2]。笔者认为，与其将后二者视为钱钟书《围城》的当代版，更可以看成老舍《离婚》的当代版。因为这三部小说写的都是没结婚的想结婚，结了婚的即使想离婚又离得难、懒得离的

烦恼生存状态，但通过对三作内蕴的开掘，震撼我们的是三位作家对国人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期盼与呼唤。三作共同构筑了一份现代中国文化启示录。

一、一样的永恒主题：结婚与离婚

20世纪以来，众多有良知的作家都在共同探寻着一种足以支撑我们民族生命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老舍更是在文化学的层面上广泛而深入地触及了这个命题。他的所思所想所写，都是我们民族在现代走向中新的主体建构问题，即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面对世界。

能够被多数人承认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的，不外乎生与死，情与仇。没有生，谈何死。情与仇，又是一组相生相克的矛盾对立。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倡导的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化的，但一切贴近大多数人民群众、贴近他们的生活，并促进历史和社会前进的，都合乎广义的主旋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触及的三部小说从主题上看，有着一样的永恒性。只是这共同的主题是寄寓于人生的大事即结婚与离婚之中的。寻找其中的“一样的”，用得上“中国特色”四个字。三部小说中主要人物身上渗透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处处伴随着“中国特色”的介入。

三部小说均不以题材的“重大”取胜，然而又都与生活的“主旋律”相通。它们的成功主要在于观察的敏锐和开掘的深细；当然，在“度”上并不整齐划一。列宁有过这样的名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有没有提供现代

新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老舍的《离婚》中那些灰色的市民官员及其知识分子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只“闹”而不“离”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小市民卑微的灵魂律动，由此而暴露了旧中国官僚机构的极端腐败和特务制度的肆虐，和当时左翼作家的创作有着一个相通的“大主题”：中国人民求生存的挣扎以及他们的追求和整个社会制度之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正是以独特的主题提炼，扩大了中国现代进步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老舍让那位市民圈子中的显微镜兼天平的“智者”张大哥统领着一群闹离婚纠葛的人物不断上演只闹不离的悲喜剧，将人物都拴在婚姻这个“木桩”上，在生活的夹缝中左奔右突，只求用庸人的哲学来保护卑微的生存。张大哥以介绍婚姻和消灭离婚操纵着人们的心灵，最后让几对闹离婚的夫妇都回到了万事大吉的轨道，真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结局。张大哥种种达到艺术高度的作为，归根结蒂就是诚意的敷衍和庸人的悲剧！通过结婚与离婚来彰示和批判我们整个老大民族的妥协、苟且、怯懦的个性。我们还在小说中看到一个和张大哥一样只有姓没有名的老李。他不是显微镜和天平，却是旧时代的弃儿和新时代的伴郎。不论他灵魂深处有一个多么“诗意”的王国，也不论他那一点可怜的“浪漫”有如何高超的贵族气，但他的一切行动仍然是苟安敷衍的，最后也只能回到张大哥“常识”的轨道上来认命，老舍最终还是不忍心让老李成为“张大哥第二”，所以让老李开始觉悟到：“还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而是有个更大的东西，根本要不得。”“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因此，“要从

新的整部的建设起来”！

相对于《离婚》而言，《懒得离婚》（下面简称《懒得》）、《中国式离婚》（下面简称《中国式》）并不仅仅是来自不同时代的单纯的关于中国现代人和当代人结婚离婚的报告，它们其实都是一种象征，一种现当代人生存处境的象征。巧的是老舍戏称他小说中的邱先生为“苦闷的象征”，而三部小说中的三个男主人公老李、刘述怀、宋建平，哪一个不是“苦闷的象征”？他们身上的传统性和现代性都在剧烈地撕咬，铸成了他们的双重人格，也就是新旧交替时期或社会转型期人性的共同弱点。瓦雷里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时说他自己：“我被一分为二……我感到自己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人。在这两种存在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定期的对称摆动。在这两种彼此没有联系的世界中都有我的份”^[4]，他又自言：“生命的旅程把我带到了我的两极。”^[5] “我在智力上有一种‘精神分裂症’”^[6]。这些深邃的自剖完全适用于三部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他们的“精神分裂”不仅止于“智力”上的，更突出的是结离婚问题上呈现出的人格的不统一、不完整、不和谐。连不乏玩世不恭人生哲学的刘东北（《中国式》的重要人物）都道出了如此的真知灼见：“男女间的背叛可分为三种：身体的背叛，心的背叛，身心的背叛。通常人们在意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对第二种基本上是忽略不计。但要我说，心的背叛的严重程度远在身体的背叛之上……”三部小说共同的“永恒主题”正是这“心的背叛”的苦闷和苦果。80 年代的作家谌容、21 世纪初的王海鸰笔下上演着结离婚的悲喜剧的众生，正是当年老舍笔下活跃的那一群，都像老李那样“老觉得自己是个新人物，有

理想，却原来是地道的怯货。”这三位作家透过爱情与婚姻的背离来透视中国家庭，透视中国的宗法制度和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懒得》中通过街道居委会庞主任的口，道出了中国“文明”“就是（夫妻）好好过日子，别打架，别怄气，别三天两头上房揭瓦，家宅翻乱的。”包括西屋的赵大婶、东屋的李大妈、南屋的任奶奶、单位的女工委员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唯恐凤兰离婚所作的政治动员，和中国几千年传统文明的高度吻合暂且不说，就连报社记者部的主任也对女记者方芳布置任务：“与其写离婚，不如写不离婚的可贵……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式》中那位年轻纯情善良的女性娟子，也深谙“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这个早在《离婚》中张大哥那里就奉行执著的中国传统经典。

“永恒主题”在三部小说中，或潜或显，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结婚是中国式的，离婚是中国式的，误解是中国式的，消解是中国式的，连夫妻男女之间的感情因素都是中国式的。

中国式结婚，在《离婚》及那个年代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而男性媒婆张大哥的撮合婚姻还兼办“收容所”，更是达到了中国式的“艺术”的高度，使读者不能不叹服中国文明之古之经典，应该轮到西方人来望洋兴叹了。但当时的车轮已经滚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懒得》中的刘述怀、张凤兰们，又有多少程度的实质性的突破呢？小说的开端就寓意深长，作家谌容这样写道：“倒霉就倒霉在那个星期天，要不是那个星期天，接到那个电话，跑到公园里去，怎么会陷入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境

地？”而女记者方芳也就偏偏被街道办事处的“马列老太”引导来采访了这个精神文明贯彻得好、日子过得“和美”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为了报答记者的盛情，还不惜苦搜记忆，回想那一天两人“见面”的有关细节，让记者能将这“新”时代的中国式结婚写成专访“见报”。作家让我们不能不去反思这种“精神文明”的属性，至少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说有几分封建主义精神也不为过。所以，我们会在《懒得》中体味到一种老舍式的“忧世伤生”，作家俯瞰着芸芸众生，在忧世伤生中又夹杂着温和的嘲讽揶揄，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喜剧（或喜悲剧）就这样提炼出了永恒的主题。再看《中国式》中的中国式结婚。宋建平和林小枫从定情到结婚可真是感人肺腑的。尤其是林小枫在小火车站抵御冬夜的严寒整整一夜，为的就是与宋建平相见八分钟！两人携手相对无言，“那一刻，一个个誓词炸弹般在宋建平心里爆炸，轰响：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一生牵手！非她不娶！”这和西方式的婚姻迥异其趣的牵手，这种建立在真爱基础上的结婚，是足以使众多读者对中国式的婚姻赞赏不已的，只是最终还是演化成了中国式离婚。倒是作品中刘东北的婚姻观，或许有着更多的“世界性”与“当代性”，只是能永恒多久，目前尚难预料。那是当前真正令人眼热心跳的一群，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有能力，在中国经济做贡献的同时，迅速地富有了自己。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婚姻不过是诸多不完美的男女性关系中相对完美的一种，追求完美的人不适合婚姻。对宋建平的恋爱十年，结婚三年，然后闹中国式离婚，在刘东北看来，他们的感情和感受都是真实的，但这真实只能证明“所有的爱，只存